

为了生存与发展,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靠的是不断创新来取得自身发展的动力。人类之所以能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器到铁器时代,以至于到今天的信息时代,正是不断创新的结果。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不妨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事实:清朝康熙乾隆年代,中国的国力在世界排名第一。而这辉煌之日,也恰恰是开始落后之时。当时的统治者拒绝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不足为大”。正是因为拒绝创新,不肯接受新鲜事物,中国才走向了落后。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提高我们民族的竞争力,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彻底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命运。



改革创新与新的发展观

王岐山

创新之所以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还在于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生产力在疾速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面对总在变化的形势,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地通过创新来解决各种新问题。所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强调面对新情况,要有新的发展观。其实,新的发展观就是一种创新,就是与时俱进。只有确立新的发展观,才能解决好一系列新问题。

我们在创新实践中,最重要的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密切联系实际。那么,结合北京的实际,我们应当在哪些方面树立新的发展观?

首先是在经济建设上。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必须注重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偏重数量扩张,忽视经济质量,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导致重复建设严重,产业结构雷同,效益不好,这是过去相当长时间我们在经济发展上的主要问题。这些年的教训提醒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提高效益和质量,一靠科技创新,二靠调整结

构,三靠加强管理。特别是科技创新,无论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还是对一个企业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拿北京的名桃来说,现在是样子越来越好看,个儿越来越大,但味道却出了问题。大家在市政府食堂吃饭时,一致的结论是:吃桃的感觉像吃苳蓝似的。我问:“这是北京的名桃吗?”说“是”。我又问:“名桃是这味儿吗?”说“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儿?质量出了问题。质量下降,从根本上说是科研没跟上去。忽视科技创新,老的品种会退化,新的品种培育不出来,生产力怎么发展?因此,没有科技创新,无论小到一个产品的质量和效益,还是大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是没有保证的。我们必须把科技创新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

其次是在文化建设上。我们要搞清,投资

环境和先进文化是什么关系？和历史文化是什么关系？我们在研究投资环境的很多问题时，应该进行文化上的思考。比如我们对原有的由政府决定的商业合同如何对待，就有一个文化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大力优化发展环境，推出了“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等举措，都很好。但我们对历史遗留的问题处理不好，一件事就能破坏我们招商引资的信用。信用是什么？信用是一种文化。我们要在结交新朋友的同时处理好同老朋友的关系，这比开几个招商会都起作用。每一个进来的投资者，在我们这里挺好，比他自己预料的还好，他就成了一个宣传员，会到处大讲特讲替你宣传的。投资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信用文化建设。诚实守信，对商家如此，对政府更如此。改善投资环境，要在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而在软件建设上，很多都和文化有关，我们要加强研究。

北京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如何保护古代优秀灿烂的文化，保护好历史风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要以新的发展观来审视。南池子改造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的。它使我们明确了这样几条原则：危房是一定要改造的，不能让群众总住在条件简陋、生活不便的环境中；文物是一定要保护的，文物是我们这个古老城市的宝贵财富和资源；历史风貌是一定要体现的，要使历史文化风貌成为我们北京的一大景观。明确了这三条，有利于我们处理好发展建设和历史文化的关系。也有利于处理好广大人民群众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问题。

第三是在城市管理上。我们实现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不光是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个城市管理的问题。应该说，在城市管理上，我们遇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现在群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穿住行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于是开始关心起居住环境、社区建设等问题。对于环境的脏、乱、差等问题变得日益不能接受和容忍。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新变化。解决这个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我们就要向垃圾、污水、厕所等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开战。2008年举办奥运

时我们要接待300多万境外观众，光记者就有一万多人，这是绝好的宣传我们自己的良机。可我们的环境卫生状况如果不好，让人家怎么看？现在北京四环以外，有73个大垃圾堆，不解决不行啊！一边是各种漂亮的新建筑，光彩夺目，一边是垃圾成堆，厕所臭烘烘，说得过去吗？你说是“新北京、新奥运”，连环境卫生问题都解决不好，叫什么“新北京、新奥运”。所以说，城市建设、发展与管理要协调，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发展是主动的，管理是被动的，说起发展，又建了什么什么，产值是多少，津津乐道，但管理都干了什么，讲不清，也没的讲。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将城市管理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这次非典期间，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管理问题。特别是社区管理问题，备受人们关注。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基础的基础。像管理外来人口和环境卫生，都要社区直接去做。所以，我们务必要强化社区的管理作用。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要社区来做，给社区增添许多负担。有些管理任务政府的各个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不能什么都往下推，要把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延伸到社区。总之，建设与管理都要到位，否则就会出问题。在这方面，政府部门责任要明确，体制要理顺，要有新的思路、新的举措。

众所周知，近些年，我们为了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作出很多的努力，比如加快道路桥梁的建设，比如加大财政投入等等。但北京还是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严重堵车时期。堵车使交易成本大大提高，特别是时间成本昂贵，出来难，回去也难，本来一个小时就能办完的事，现在要用两个小时，时间浪费严重，效益也就不高。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但解决起来很难。我们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正在研究制定当中，要想实现还需若干年，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中心区的状况短期还得不到改变，地下交通和公共交通的瓶颈造成自行车和机动车混行，大院格局使城市路网被隔断，停车场建设不足使地面停车占用了行驶的道路，有些居住区功能不完善，人们要出小区去解决各种问题，有的

居住区人口密度偏大,又只具备居住功能,早晚人们要出来进去的上下班,改变这种现状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举办奥运使北京的建设迅猛发展,奥运场馆的建设,地铁及道路桥梁的修建、危房的改造、城市管网的铺设维护,作为首都国事、外事的交通管制等等,这一切都使得未来奥运工程集中建设期的交通状况雪上加霜。交通需求不断加大,汽车消费更是快速增长,原来估计,到2010年,北京的汽车将发展到200万辆,结果今年就实现了,提前了7年,车辆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了交通拥堵的加剧,可我国实现小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又决定了必须大力发展以汽车为龙头的现代制造业,不仅不能限制汽车消费,还要千方百计的刺激汽车的消费。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实际情况,而不能无所作为,不能听凭这种局面长时间延续下去,不能总照老章程行事,要千方百计缓解交通拥堵,加强交通管理,对人们进行行之有效的遵守交通法规的宣传教育,找到新办法、新出路。目前市委、市政府,正在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广泛征求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力争出台一些新的举措,以使北京的交通状况有所好转。

第四是在体制改革上。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我们必须不断进行体制改革。事实上,在体制上,改革的任务还很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我们要不断探索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我们尝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甜头。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我们的国力不断增强,人们逐渐富裕起来。成绩举世瞩目,毋庸讳言。但改革没有尽头,创新没有止境,尤其体制的变革更是长期的。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在变革中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所谓变革,实际上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让其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体制变革,涉及观念问题,更涉及利益问题。所以,体制创新要有勇气,对原有的利益格局,要有勇气承认它,又要有勇气打破它。比如说,在处理垃圾问题上,就需要进行体制改革。现在北京的垃圾处理工作主要由环卫局的一些公司来承担,财政给他们拨款。这些年,北京对处理垃圾的财政投入逐年加大,这些

公司吃财政也吃得越好。如果按照新的发展观来看问题,垃圾处理有一部分是可以面向市场的,可以吸纳广泛的社会资本加入。但享有既得利益的单位就不愿意让别人进来,带有一定的垄断性。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排斥既得利益,但应走向市场的一定要走向市场,能向市场开放的领域就一定要放开。具体说来,增量部分,可直接搞体制的创新,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存量部分,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逐步解决体制创新的问题。

再比如中关村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关村这几年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已经成为北京的一大亮点。但进一步发展,要靠创新,特别是体制创新。中关村作为高科技园区,政府和企业要摆好位置。政府在中关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在制度创新上上下功夫,建章立制,搭建好一个能不断激发和保护创新的制度平台,而不是什么地皮、项目。这个制度平台是最重要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一系列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对中关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说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技术转让的制度平台,成立产权交易市场等。中关村的整个社会服务,是其所在地区各级政府的职责。在这样一个责任明确、约束清楚的制度平台上,处于中关村主导地位的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刚开始建设中关村的时候,政府必然是主导,现在不该是了,因为中关村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现在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标准和监督上下的功夫少,在审批上下的功夫多,在宏观调控上思路不够,在具体事上考虑的却很多,这种状况要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对中关村至为重要。

强调新的发展观还要妥善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稳定是最重要的,最具全局性的。发展要靠创新,改革也要靠创新,但都要服从服务于稳定这个大局。北京是首都,这个问题尤其不容忽视,这是我们在不断创新时,须臾不可忘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把“三个代表”与实践操作紧密联系,分寸火候把握恰当,循序渐进,发挥高超的领导艺术。□

(作者: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责任编辑:臧本逊